



# 中国“世界文化名人”与 “千年英雄”艺谭

李 新 刘昊旻 著

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还有苏轼，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享誉文坛的名家，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影响深远。其中，前四者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四大“世界文化名人”，而苏轼则为世界“千年英雄”之一。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重点基金课题：中国“世界文化名人”与“千年英雄”论

编号：2013S01

# 中国“世界文化名人”与 “千年英雄”艺谭

李 新 刘昊旻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世界文化名人”与“千年英雄”艺谭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世界文化名人”与“千年英雄”艺谭 / 李新,  
刘吴旻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66-0588-7

I. ①中…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2875号

ZHONGGUO"SHIJIEWENHUAMINGREN"YU"QIANNIANYINGXIONG"YITAN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 / 16 ( 710mm × 1000mm )

字数: 248千字

印张: 14.75

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588-7

定价: 36.00元

## 前 言

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还有苏轼，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享誉文坛的名家，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影响深远。其中，前四者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四大“世界文化名人”，而苏轼则为世界“千年英雄”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仍然受到潜在威胁，国际局势十分紧张，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1948年11月，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来自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召开，要求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共同保卫世界和平。1950年11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并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德国的柏林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要求五大国（美、苏、中、英、法）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签名运动，签名人数达6亿多人，其中中国有3亿多人签名。本次会议上，我国明代名医李时珍被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1953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并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先秦的楚辞作家屈原名列其中（此外，还有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法国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何塞·马蒂），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这一年端午节前后在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在这次展览上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与此同时，苏联各界在莫斯科集会，隆重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我国驻苏大使戈宝权在大会上致辞。这是我国古代文学领域首位被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知名作家。

1958年，一生创作杂剧60多种，被誉为“曲圣”、东方的“莎士比亚”的元杂剧

名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1962年,为纪念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大诗人、“诗圣”杜甫诞辰12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他为“世界文化名人”。之后,我国古代小说巅峰、“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学大师周汝昌称之为“稗圣”),也被各国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中国北宋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名列其中……

足见,这五位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作家,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代表人物,而且是对世界文化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和深远影响的大文豪!然而,当前学界虽对上述五位作家有着不同程度的探究,但大多为各自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较少加以合论,以探究、发掘其前后相继、互为扬弃的文学接受史与文化遗产学价值意义。世界和平理事会所推选的中国“世界文化名人”尚有李时与齐白石,因非属文学领域,不在本书研究观照范围内,特此说明)。

因此,本书拟采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宏、微观研究相结合,文本细读与原典考察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计划先从原典整理,思想、题材与艺术分析、考辨入手,并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如笔者的专著《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研究》(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杜甫诗史因革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论文《论杜甫思想对屈原精神的传承》(《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试论苏轼对于杜诗的艺术批评与接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试论杜诗与关剧思想、艺术的相同之处》(《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论〈红楼梦〉对于杜诗的接受》(《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等,结合当前学界最新成果,全面、深入、系统地考镜上述五位作家、文豪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思想、题材、艺术等方面的前后因、革,传播与接受,预期填补相关学术领域之空白。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篇 .....    | ( 1 )   |
| 第一节 爱国忧君,忠贞不渝 .....      | ( 2 )   |
| 第二节 以民为本,力求美政 .....      | ( 4 )   |
| 第三节 修身进德,嫉恶扬善 .....      | ( 6 )   |
| 第二章 “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篇(上) ..... | ( 9 )   |
| 第一节 杜诗之风格探微 .....        | ( 10 )  |
| 第二节 杜诗之体裁探微 .....        | ( 27 )  |
| 第三节 杜诗之章句探微 .....        | ( 49 )  |
| 第四节 杜诗之炼字探微 .....        | ( 64 )  |
| 第五节 杜诗之用典探微 .....        | ( 78 )  |
| 第六节 杜诗之对仗探微 .....        | ( 104 ) |
| 第三章 “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篇(下) ..... | ( 116 ) |
| 第一节 杜诗“集大成”说探微 .....     | ( 116 ) |
| 第二节 杜甫“诗圣”说探微 .....      | ( 138 ) |
| 第四章 “千年英雄”苏轼篇(上) .....   | ( 156 ) |
| 第一节 苏轼论杜与学杜 .....        | ( 156 ) |
| 第二节 苏辙论杜与学杜 .....        | ( 161 ) |
| 第三节 苏诗对杜诗的创作接受 .....     | ( 164 ) |
| 第五章 “千年英雄”苏轼篇(下) .....   | ( 168 ) |
| 第一节 苏轼之儒家和谐理念 .....      | ( 168 ) |
| 第二节 苏轼之儒家教育理念 .....      | ( 172 ) |
| 第三节 苏轼之咏海棠诗探微 .....      | ( 176 ) |
| 第四节 苏轼之咏中秋诗探微 .....      | ( 179 ) |

---

|        |                      |       |
|--------|----------------------|-------|
| 第五节    | 苏轼研究商榷与书评 .....      | (182) |
| 第六章    | “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篇 .....   | (188) |
| 第一节    | “曲圣”、“诗圣”，异曲同工 ..... | (188) |
| 第二节    | 关汉卿杂剧之“关公剧”探微 .....  | (195) |
| 第七章    | “世界文化名人”曹雪芹篇 .....   | (201) |
| 第一节    | 曹雪芹对杜甫的创作接受 .....    | (202) |
| 第二节    | 曹雪芹对苏轼的创作接受 .....    | (206) |
| 第三节    | 通灵宝玉之艺术原型探微 .....    | (211) |
| 第四节    | 凤姐之“群众关系”探微 .....    | (215) |
| 参考文献   | .....                | (221) |
| 后    记 | .....                | (227) |

## 第一章 “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篇

1953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并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中国楚辞作家屈原名列其中(此外,还有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法国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何塞·马蒂),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这一年端午节前后在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在这次展览上首次展出了屈子祠和屈原墓的照片。与此同时,苏联各界在莫斯科集会,隆重纪念屈原逝世 2230 周年,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我国驻苏大使戈宝权在大会上致辞。

屈原(公元前 340—公元前 278 年),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芈(mǐ)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他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公元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现在定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

屈原,以其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忧国忧民、正直高洁的人格品质,即所谓“屈原精神”,对后世的文人士子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人民的诗人——屈原》)而“转益多师”(《戏为六绝句》其六)的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在思想品格上对

于屈原精神加以继承和接受,并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以下即按屈原精神三方面的质性特征,具体揭示杜甫如何对其加以接受和发扬。

## 第一节 爱国忧君,忠贞不渝

屈原的爱国情怀,充分表现在他对故土的热爱,对国君的忠贞,和对振兴家国的责任感上。楚国远离中原,君主仅为子爵,长期受中原各国歧视,甚至被视为落后的“蛮夷”之邦,然而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正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sup>①</sup>,并在作品中一再声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以期“存君兴国”,引导、辅佐楚王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愿;而被逐之后,他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楚辞·离骚》);“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sup>②</sup>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不灭报国之志,其忠君爱国之情是何等坚贞!

并且,诗人还在其作品中,热情地讴歌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如《国殇》一篇,赞美了楚军将士同仇敌忾、慷慨赴死的刚强性格——

操吾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土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縶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怆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楚辞·九歌·国殇》)

<sup>①</sup>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1页。

<sup>②</sup>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5页。

悲壮的诗句,既是对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英雄气概的歌颂,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而在《橘颂》中,则对于“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楚辞·九章·橘颂》)的橘树予以礼赞,借橘树赞美坚贞不移的品格,其与诗人屈原的抒情形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中体现出了诗人忠于楚国,至死不渝的精神。

当屈原得知楚国郢都被秦军攻陷、楚怀王受辱于秦,百姓流离失所之后,诗人则以十分沉痛的笔触写下:“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楚辞·九章·哀郢》)的诗句,表明了自己那颗眷恋祖国的赤子之心。诗人虽曾在被放逐后萌生过“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楚辞·离骚》),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最终,诗人选择了投江汨罗,更是鲜明表达了他不愿离开故土的爱国情怀,这在楚材晋用,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这也是千百年来屈原一直能够得到后世文人士子敬重和效法的根本原因。

而出身于“奉儒守官”<sup>①</sup>(《进〈雕赋〉表》)之家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继承了先秦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传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成为其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在这一点上,他可谓与屈原遥相呼应。尤其是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文人士大夫纷纷自顾性命、脱身远害,甚至有许多大臣为求活命,不惜向叛军屈膝投降;而杜甫在大乱之际,不顾个人得失,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闻肃宗灵武称帝,匆匆安置好家属,只身远赴灵武,欲辅佐肃宗平叛。后不幸被俘,押往沦陷后的长安。次年春,诗人目睹沦陷近一年的长安城之惨状,感而赋《春望》一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五律通过眺望沦陷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抒写了感时恨别、忧国伤世的深沉感慨,如宋代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所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

①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2页。

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sup>①</sup>山河依旧却国家沦亡，春色满城却荒无人迹，以有衬无，使得诗人对于国破家亡的感慨之情更加沉痛；继之观花而溅泪，听鸟而惊心，以乐衬哀，见国事时局之艰；篇末则以诗人自身忧国伤时之抒情形象收结，情感深沉厚重，爱国之情，尽显其间！

后杜甫历尽艰辛，逃离长安，“麻鞋见天子”，“涕泪受拾遗”（《述怀》），足见其一腔忠君爱国情之赤诚！其后虽遭贬抑，弃官远逝，然无时不时局，忧心家国命运；而被清人浦起龙誉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读杜心解》卷四之一）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也是因“安史之乱”平息而狂喜，可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杜甫曾有诗云：“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虽为赠李白而作，但在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这一方面，屈、杜二人可称异代知音，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 第二节 以民为本，力求美政

屈原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然而“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励精图治，以民为本，重用贤臣，以实现其所追求的“美政”理想——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sup>①</sup> 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278页。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憺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

而实现“美政”理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更鲜明的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而屈原在其作品中也多次提到了民本思想，如“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陆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楚辞·离骚》），从中可以看出他以民为本的精神思想，并且敢于对忽视民生的君主给予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楚辞·离骚》）；即使在他被放逐的时候，所想的依然是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楚辞·抽思》）；这些正是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屈原在诗中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鞢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楚辞·离骚》），表达了愿为“美政”理想而献身的执着精神！

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杜甫，在其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这样重视民生与同情百姓疾苦的民本与仁政思想。早在困居长安时期，杜甫即已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他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地揭露了天宝后期玄宗君臣的腐化堕落，也从中体现了诗人的民本思想，“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指出统治者的挥霍无度，正是建立在对平民百姓的压迫、剥削基础之上的；也正是由于他们不以民为本，才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在诗人后半生的漂泊流离岁月中，他仍不断对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加以揭露，并对搜剥百姓，不顾民生的贪官污吏给予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如“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等诗句，比比皆是。

正如宋人黄彻《砵溪诗话》中所说：“《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sup>①</sup>“宋人喜言杜诗”（《四库全书总目·九家集注杜诗提要》）<sup>②</sup>，亦能准确道出其诗中的思想内核。可见，杜甫的民本思想，在精神实质上，也是对于屈原“美政”理想的传承。

### 第三节 修身进德，嫉恶扬善

而为了“存君兴国”，实现“美政”理想，屈原则反复强调修身作用，将修身提升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所惩。”（《楚辞·离骚》）而在他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於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楚辞·离骚》），以及“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荃壁兮紫坛，翳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薜荔橑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楚辞·九歌·湘夫人》）等细节描述，则是诗人高洁人格通过比兴象征修辞手法的艺术化表达。在屈原看来，修身是治国的前提，这也是同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① 宋·黄彻：《砵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页。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1页。

下”(《礼记·大学》)的人生价值观相一致的。

然而,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余虽好修姱以鞿鞢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忸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楚辞·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终至“信而见疑,忠而被谤。”<sup>①</sup>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他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做一棵“香草”,正所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虽九死其犹未变兮”(《楚辞·离骚》);甚至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楚辞·离骚》),足见这种对于高洁品质的坚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而杜甫也曾因坚持真理,而遭受贬谪,至德二年(757年),时任左拾遗的诗人出于对社稷之忧,才不惜触怒肃宗疏救房琯,不想却被列入打击之列,诏三司推问,后遭贬为华州掾;加之亲眼目睹肃宗昏庸,一味听信皇后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等宵小之辈之谗言,在攻打邺城的九节度军中不设主帅,致使贻误战机,全军溃败,其后抓丁拉夫,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其诗中所批判的那样,——“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所以才对肃宗朝廷失去信心,决然弃官华州而去。他在赠李白诗中写道:“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亦是诗人自况。

而在流寓秦州时期,杜甫作了《佳人》这首富于象征意义的诗: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杜诗中塑造了身处乱世,又被夫婿抛弃,幽居空谷的佳人形象,用比兴的手法

<sup>①</sup>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

赞美她的高洁情操，且以男女君臣相喻，寄寓了自己不遇于肃宗、忠而被贬的遭遇；而最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只用写景，不更着议论，而清洁贞正意，自隐然言外”<sup>①</sup>，则以坚贞不屈、独倚修竹的佳人形象作结，隐喻自己不肯对昏庸的肃宗苟且屈服，终将怀贤守节以退，独善其身的志向。正如夏力恕先生所说：“《佳人》名篇，亦左徒（屈原）迟暮之意，盖因所见而写成，以自喻且自嘲耳。”（《杜诗增注》卷五）足见其对屈原修身进德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综上所述，屈原以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忧国忧民、正直高洁的人格精神，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圣”杜甫对于屈原精神的继承，即为十分显著的一例。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称：“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骚人嗟不见，汉选盛于斯。’则知杜之所得在《骚》。”<sup>②</sup>可见，杜甫对于屈原的继承，不仅在于对屈骚为代表的《楚辞》的宗法，也在于对其精神品格的传承和发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屈原、杜甫共同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那高尚的精神品格，必将成为世界人民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① 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页。

②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 第二章 “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篇(上)

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的价值,是关心人跟人之爱,宽容的这种品质。他的死亡、他的去世、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个谜。对后代的更大的影响是对于后人一种人格塑造或者道德建树上,这方面的影响更加大一些。伟大的诗篇往往产生在不是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恰恰产生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文学的任务、诗歌的任务才突现出来,杜诗的意义也是这样突现出来。因此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到危难困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因为《荷马史诗》中间缺乏这种东西。实际上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外。从13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我们的东亚邻国进行广泛传播,韩国、越南、日本,到了1481年韩国就出现了世界上首部完全把杜诗翻译过去的一部著作,叫《杜诗谚解》,完全译成了韩文。“在1983年的《莫斯科之秋》音乐会上,尼古拉·西杰利尼科夫根据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家别》、《梦李白》等26首诗配曲而成的《四川悲歌》颇受欢迎。作曲家说:‘杜甫的诗反映了最深刻的人类共同的思想,它和米开朗琪罗或莎士比亚的诗一样,是属于人民的。’”<sup>①</sup>所以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界,他是一个真正的属于世界人民的文化名人。

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作品被称作“诗史”,其存世的诗歌有1458首之多,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颇具特色,杜诗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五大“显学”(《诗经》学、《文选》学即“选学”、《文心雕龙》学即“龙”学、杜诗学、《红楼梦》学即“红”学)之一。正如钱锺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所说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

---

<sup>①</sup> 张壮年,张颖震:《中国历史秘闻轶事·唐诗与外国歌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大诗人一直是杜甫”<sup>①</sup>，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中所论亦曰：“（杜甫）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sup>②</sup>

## 第一节 杜诗之艺术风格探微

有宋一代，由于印刷术的革新与推广，在客观上为杜集的编纂与评注提供了便利条件，出现了所谓“千注杜诗”<sup>③</sup>的盛况，这也为宋人通读杜诗并了解其艺术全貌提供了可能；因此，宋人对于杜诗艺术风格的认知较为全面，既包括对其“沉郁顿挫”之主体诗风的认定和阐释，也有对其多样化的风格表现的体认。

### 一“沉郁顿挫”论

“沉郁顿挫”，本为杜甫天宝十三载（754年）在《进〈雕赋〉表》中对其诗赋作品的自我评价：“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sup>④</sup>后世遂以之作为杜诗主体艺术风格的定评。至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八曾引述此表云：“老杜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上书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企及也’……甫以诗雄于世，自比诸人诚未为过。”<sup>⑤</sup>惜其对“沉郁顿挫”未从风格角度加以指认。至严羽《沧浪诗话》，始在其“诗体”篇，专门标举“少陵体”<sup>⑥</sup>，代指杜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在“诗评”篇以李杜比较的方式，概括出杜诗的主体风格：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sup>⑦</sup>

①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

② 闻一多：《唐诗杂论》，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页。

③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6页。

④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72页。

⑤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⑥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⑦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8页。